**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题目：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福柯的历史先验概念探析**

**学 号：** 1411371 7

**姓 名：** 张涵音 7

**年 级：** 2014级 7

**学 院：** 哲学院 7

**专 业：** 哲学 7

**指导教师：** 贾江鸿 7

**完成日期：** 2017年4月20日 7

**摘 要**

爱尔兰著名现象学家莫兰（Dermot Moran）在近年来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胡塞尔的先验概念和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概念进行了探析和对比，他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源自于胡塞尔的先验概念，但福柯也误解了胡塞尔的先验概念并且在使用上也有很多不够清晰的地方。一方面，福柯所追求的历史先验性缺少了胡塞尔先验概念中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内涵，这就可能会导致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另一方面，胡塞尔的先验概念是其历史哲学的原初基础，其所强调的“内部历史”的概念说明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类及其生活世界，胡塞尔将历史性作为一种普遍的先验进行考量；而福柯则并未考虑到人类及人类的“在世”问题，因此可能会倒向非理性。本文通过比较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和胡塞尔的先验概念，以及梳理福柯历史先验性背后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法则，尝试着对莫兰的批评提出一种可能的回应。

**关键词：**历史先验性；先验；知识考古学；权力-知识；内部历史

**Abstract**

The famous Irish phenomenologist Dermot Moran makes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n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and the historical priori of Foucault in one of his recent papers, he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Foucault’s ‘historical a priori’ comes from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while Foucault mis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and uses the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in ambiguous way. On one hand, Moran thinks that the ‘historical a priori’ from Foucault, which is short of the inevit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meaning of the transcendental concept of Husserl, may lead to the dilemma of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relativ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is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internal history", which is emphasized by the author, means that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s o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living world. Husserl takes history as a general prior consideration. Foucault, however, did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ir "living in" the world, so his theory may fall into non-rationalism. In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Foucault's “historical a priori” with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concepts, as well as review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Foucault's “historical a priori”, a possible response to Moran's criticism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historical a priori; transcendental;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ower-Knowledge; internal history

目 录

[引言 1](#_Toc480644573)

[一、莫兰对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解读及其问题 3](#_Toc480644574)

[（一）莫兰的解读 4](#_Toc480644575)

[（二）可能的问题 6](#_Toc480644576)

[二、考古学到系谱学：权力-知识理论探析 9](#_Toc480644577)

[（一）考古学到系谱学背后的理论法则 9](#_Toc480644578)

[（二）权力-知识法则与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 11](#_Toc480644579)

[1.福柯思想体系中的权力 11](#_Toc480644580)

[2.福柯思想体系中的知识 12](#_Toc480644581)

[3.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 13](#_Toc480644582)

[4.胡塞尔历史性概念与福柯权力-知识理论的比较 15](#_Toc480644583)

[（三）对莫兰的批评的回应 17](#_Toc480644584)

[1.权力-知识理论的基础——历史先验性 17](#_Toc480644585)

[2.权力-知识理论的研究方法——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向 17](#_Toc480644586)

[三、结语：历史先验性基础下的权力-知识法则 19](#_Toc480644587)

[参考文献 21](#_Toc480644588)

# 引言

在福柯的理论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历史先验性，这一概念从始至终贯穿了福柯的学说，福柯在不同著作中对其有不同表述，并且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下这一概念有不同的内涵。

福柯关于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萌芽期、话语分析期和权力-知识理论期。萌芽期主要是福柯受到心理学的启发而萌生关于历史先验性概念的思考。话语分析期可分为两个阶段，《词与物》是其第一阶段的代表作，福柯在其中批评了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指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性受到特定的先验主体性概念——“我思”的限制，并且它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现代性的一点上产生，因而缺乏了历史性[[1]](#footnote-1)。在此阶段，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内涵主要表述为“认识型”。《知识考古学》是第二阶段的代表作，福柯在此书中着重分析了形式上的先验和历史的先验，并指出历史的先验“是一纯属经验的先验”。[[2]](#footnote-2)在权力-知识理论时期，福柯提出了新型的权力观，指出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出版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福柯提出：“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footnote-3)在话语分析时期，福柯研究方法的重心是知识考古学，而辅之以系谱学；在权力-知识理论时期，他将研究方法的重心由知识考古学转移到系谱学，从而实现了从非理性的话语实践到理性主义的权力-知识-主体问题的转向。

由于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权力-知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解读。例如，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在《福柯 褶子》中利用拓扑学为权力-知识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他认为“积层是历史构成、基础性或经验性”，德勒兹认为“福柯的可见性场所与陈述领域绝对不会具有相同的节奏、相同的历史、相同的形式”[[4]](#footnote-4)，人们选择遗忘了“可见性理论”，因此歪曲了福柯的理论以及他的历史观念。沃夫冈•德特尔（Wolfgang Detel）在其文章《福柯论权力与意志》（Foucault on Power and the Will）中认为，福柯发展的权力-知识关系是一种具体而实在的关系。国内学者莫伟民也在文章中指出，福柯在权力-知识理论中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处于权力-知识关系之中的历史主体的存在。

爱尔兰著名现象学家莫兰（Dermot Moran）对福柯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在其文章《福柯和胡塞尔历史先验性的结构》（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中对于胡塞尔和福柯历史先验性条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莫兰提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是对胡塞尔的继承与发展，但他又指出“胡塞尔可能会认为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就像他早期时候评价狄尔泰），并且最后以至于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困境，并且放弃了驱使着所有人类的认知的努力的科学意志”[[5]](#footnote-5)。莫兰在文章中指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概念的意义是模糊的，福柯并未理解胡塞尔先验概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同时也未能对先验概念中的核心“历史性的先验性”，也就是历史的内部概念作适当的理解，因此福柯可能会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

莫兰对福柯早期历史先验性概念的质疑确有其合理性，但是其简单地用福柯后期权力-知识理论的先验性否定福柯早期理论的做法存在着不合理性，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福柯在权力-知识理论时期对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发展。为此，本文试图从福柯系谱学中权力-知识的关系入手，详细梳理和考察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探究隐含在福柯话语分析以及权力-知识阶段学说中历史先验性背后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以回应莫兰对福柯的批评。

本文的内容将分为莫兰对福柯历史先验性的解读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历史先验性基础下的权力-知识探析两个部分。在第一章，本文将对莫兰文章中对福柯的批评进行梳理，指出莫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福柯后期的权力-知识理论，其对福柯的批评没有注意到不同知识背景之中历史先验性具有不同的内涵，以回应莫兰对福柯的批评。在第二章中，本文将探析福柯历史先验性基础下的权力-知识法则，证明其对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给予反驳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莫兰所得出的“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对胡塞尔的概念的误解”这一结论提出不同观点，同时证明福柯并未陷入非理性主义及历史相对论的困境。

# 一、莫兰对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解读及其问题

莫兰在《福柯和胡塞尔历史先验性的结构》一文中首先通过梳理福柯著作中出现过的历史先验性概念，指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1954年福柯的第一部出版物《心理学1850-1950》。莫兰认为“历史先验性的概念可以从福柯自1954到1969年的作品中寻找到踪迹，并且在他后面的作品中基本消失了”[[6]](#footnote-6)，福柯所提出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实际上弱化了福柯自己对权力的分析，并且福柯对于胡塞尔先验概念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莫兰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个模糊的不定型的权力/知识特征看上去正好挑战了先验性结构可以确定的概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福柯自己分析的权力。”[[7]](#footnote-7)笔者根据福柯的文本认为，莫兰的这段话的意图是想表明，由于福柯在其早期和中期的思想中认为历史具有非连续性，因此并不存在先验的理论法则，但是在权力-知识理论时期，权力-知识这一理论结构上具有先验性，因此莫兰认为这反而弱化了福柯的早期理论。

其次，莫兰在文章中着重介绍了胡塞尔关于历史先验性概念的思想，并概述了胡塞尔‘内部历史’的概念以及历史性作为一种普遍的先验的思想。莫兰将胡塞尔的历史先验性视为一种传统的近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概念，他认为在对先验概念的描述中，胡塞尔去除了大部分关于主体性的概念，同时在其概念中有着胡塞尔与近康德主义者联系的特征。胡塞尔开始关注“具体的历史先验性”[[8]](#footnote-8)实际上是在关注历史性的知识的属性，是在先验概念中加入了历史性的属性，其所代表的近康德式先验概念据其本人所言“必须被构成为异常清晰的”概念。莫兰认为胡塞尔不仅仅在讨论历史先验性和先验的历史，而是在关注‘先验的历史性’[[9]](#footnote-9)，也就是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类生活的必需的结构。

莫兰认为胡塞尔作为福柯的对立面理解了历史具有目的论的特征，并提出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性的反驳”，这个反驳涉及了一种理智的“重建”，并且“向后质疑”了西方文化的历史，是一种不同于福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的统一。而福柯则是关注历史先验性的非连续性以及话语分析方法的问题，试图利用知识考古学以及后期转向系谱学的方法来找出历史先验性背后的理论法则——福柯试图寻找的理论法则正是权力-知识法则。

福柯所提出的历史先验性是贯穿其话语分析时期到权力-知识理论时期的重要概念，并且这个概念确实源于胡塞尔的先验概念，但根据莫兰的文章，福柯历史先验性与胡塞尔为代表的近康德式先验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福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胡塞尔的先验概念而有可能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那么，福柯历史先验性是否失去其合理性，使得福柯本人的权力-知识理论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呢？莫兰的文章是否忽略了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对权力观的改造呢？在对福柯的研究中，已有大量学者对福柯权力-知识时期的历史先验性概念表示了肯定，那么莫兰对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批评是否有所偏颇，是否适应于福柯思想所有时期呢？为了回答这些疑问，下文将详细梳理和考察莫兰在文章中对福柯的批评，并考察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基本内涵。

## （一）莫兰的解读

福柯最早在1954年开始讨论历史先验性概念问题。根据莫兰的文章，福柯在1954年为现象学的精神科医生路德维格·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所著《梦与存在》（Dream and Existence）的法译本撰写导言时讨论了“历史先验性”，他将“历史先验性”放在了接近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层面上。福柯解释了人类科学的存在既不是一种积极科学也不是一种先验的哲学人类学，他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研究人类存在，历史性超越先验的形而上学和传统的实证主义类型的理解。莫兰认为福柯希望在作品中指出隐藏的结构或秩序——“也就是他所说的16世纪，在表层上存在的‘踪迹’，想要找到这些结构，不排除任何东西是必须的，它必须将自己沉浸在现象中，为了隐藏结构而创造自己的表面”[[10]](#footnote-10)。因此，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应当是隐藏在结构或者某种法则中的基础性的存在，并且这一基础性的存在包含了历史属性以及先验性。

此外，莫兰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先验。莫兰在文章中对福柯的重要著作《知识考古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处于变化之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先验，不会根据某些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或者某种自身属于先验的理性法则而变化，它只能使得某一时期特定的历史结构成为可能[[11]](#footnote-11)。因此，莫兰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概念缺少必然性和普遍性，可能使得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

除了对福柯思想的考察，莫兰还从胡塞尔的学说出发对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概念提出了质疑，他在《福柯和胡塞尔历史先验性的结构》一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举出胡塞尔“历史先验性”的原始观念以及“内部历史”的概念，并以此来证明福柯历史先验性的不合理性。莫兰认为胡塞尔关心的是在历史中有疑问的公共生活以及‘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像是胡塞尔自发的概念，“影响了海德格尔关于生活在历史性的‘我们-世界’中的人类集体概念而不是周围的其他方式”。胡塞尔想要记述“必要的”，“先验”或“异常清晰的历史”，包括指出它的隐藏目标和‘动机’的行为。胡塞尔在另一篇文章《<危机>补正》中写道：“当我们有系统地、有条理地承认历史的先验，它自身是否是历史的真实性？它是否会假定历史的先验？先验有关人类的存在以及周遭世界在经验、思想和行为上是正当的，但是先验有时是理想的和普遍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一方面先验涉及了人类自己作为课题，而在另一面先验是在人类之中的一个结构，在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那里。”[[12]](#footnote-12)在张梅、孔明安所写的《论历史先验——读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一文中，作者指出胡塞尔的“ 历史先天” 指的是“源初意义” 的在先性，从时间的历史性角度来看意义的在先性特征“标志着先天规范性的必然性以及对本质进行预先规定的必然性”[[13]](#footnote-13)在胡塞尔看来，先验概念实际上会转向“意义的历史性问题”，所有对于概念性本质的追问和回溯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行为，所有关于历史先验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生活世界的内在规律中去。[[14]](#footnote-14)

莫兰认为胡塞尔强调的先验概念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历史的先验，胡塞尔将生活着的世界等同于历史的世界，将先验的概念作为生活世界的某种必要规律，并将这一规律作为历史性的体现来佐证其历史世界的合理性。而依据上文所述，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却在必然性和普遍性上存在不足，莫兰批评福柯并未重视人类主体及其生活世界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概念缺少了先验性，这反而弱化了福柯后期权力-知识思想。因此，莫兰最终得出福柯将陷入历史相对论困境的结论。

## （二）可能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是基于人类和生活世界进行考量的， 因此历史先验性的概念并不会使得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

首先，从人类认识的方面看，福柯在《词与物》中对经验与先验曾有过如下的分析：“认识的形式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认识的功能特殊性相分离……存在着人类认识的一种性质[[15]](#footnote-15)，它决定了认识的形式，同时又能在其特有的经验内容中向认识表明。”[[16]](#footnote-16)这表明了认识是具有某种历史的、社会的或者经济的条件的，并且说明了“曾存在着人类认识的一种历史（une Whistoire），它既能赋予给经验知识，又能规定经验知识的形式。”[[17]](#footnote-17)这种历史使得经验知识得到自身应具有的形式，并且是以人类主体为中心进行考量的，这实际上与胡塞尔的先验概念中有关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世界的思想并不矛盾；同时由于福柯所认为的历史是人类认识的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客观的属性，能够决定人类认识的发展方向，因此，从主体性和客观性两方面来看，历史先验性在人类认识的方面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其次，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在话语分析时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可以分析历史先验性的合理性。部分学者的有关研究表明，福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只是将过去的事物全部看成是前人的“思想、精神、意识的体现”, 所以为了使得这些思想、精神以及意识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就必须探究这些事物的含义, 这是为了使得“过去了的东西复活过来”[[18]](#footnote-18)。历史学把一切历史上的存在都看成是可以体现前人思想、精神以及某种意识的文献，而这一文献所记载的正是前人的思想、精神以及意识——“在福柯眼里, 这正是19 世纪历史主义( 以及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 的梦”[[19]](#footnote-19)。这种历史主义认为人的精神具有独立性, 并非是断裂开来的，而是无限延展的，能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精神史、文化史、文明史[[20]](#footnote-20)。人的精神的这种特性是因为“精神自身的连续性发展”，而不是因为有其他的外在条件作为本原条件。福柯所运用的知识考古学则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思想、精神或者意义固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但各时期的思想、学说、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连续的, 而是断裂的、不连续的, 像考古学的层面一样”[[21]](#footnote-21)，这就说明了历史的非连续性特征。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还对形式的和历史的先验做出区分，并指出历史的先验“必须考虑话语不仅是有意义或‘真理’，也有其历史。它应包含的一种历史型态是一种在时间中散播的形式，一个连续，稳定化，再启动的模式”[[22]](#footnote-22)；而形式上的先验则是一种“超越的切分法”，“其管辖权的延伸是没有任何偶然意外的可能的”[[23]](#footnote-23)，福柯以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连续性来区分历史的先验和形式上的先验，这是他在青年时期受到认识论断裂说影响而导致的。此外，西方学者沃夫冈在其文章《福柯论权力与意志》中指出，福柯的思想领域核心在于“历史的认识论”[[24]](#footnote-24)，这源于福柯所关心的问题是客体领域以及构成人类科学主体的描述历史的方式。由此可知，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同样是基于人类主体和世界来考量的，并不会如莫兰所言使得福柯自身的思想陷入历史相对论。

实际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研究的知识并非某种封闭的、延续的时间, 而是“有一种横向的、扩散的、空间的, 因而是被分割开来的实体，就像没有独立的纯空间一样, 也没有独立的纯时间”[[25]](#footnote-25)，这是因为时间与空间是交错的，而非分开的。知识考古学不同于历史学而体现其合理性的地方就在于，知识考古学是要考察那些实在事物或者知识（文献）和其他事物、形式[[26]](#footnote-26)的关系，要去研究这些事物或者事物间的关系在何种层面上得以成立，而历史学却是单纯认为这些事物是早已被预定好的，是固定规律下才得以存在的。因此，知识考古学是一种非连续性的研究方法，而非单纯历史学意义上的无限连续线性方法。知识考古学中认识论断裂的存在是合理的，虽然福柯之后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尼采的理论，由知识考古学方法转向系谱学，但是系谱学的发展并未背离知识考古学，也没有脱离历史先验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历史先验性是福柯于话语分析的不同阶段在话语内部揭示话语的历史先天规则，这些规则在《词与物》中被称为“认识型”，而在《知识考古学》中被称为“档案”。因此，历史先验性在福柯思想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特别是在系谱学时期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特点。从发展的观点看，福柯的思想并未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莫兰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

此外，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包括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特征，这使得其思想中先验的意义与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同的。打破传统形而上学中先验概念的桎梏是康德以来很多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福柯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在本文看来，莫兰对福柯的批评恰恰是忽略了兼具主体性和客观性特征的系谱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先验性意义。

# 二、考古学到系谱学：权力-知识理论探析

笔者认为，若能进一步考察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来回应莫兰利用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而对福柯所提出的批评。

## （一）考古学到系谱学背后的理论法则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希望能够“借用一具有空间意象的‘考古学’来揭露以往史学因专注时间规范而产生的弊病”[[27]](#footnote-27)。福柯在这里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要取消某种思想的必然性，但这绝非是在必然性和普遍性上的不足，而是福柯希望找出连续事件或者历史学连续性的漏洞。知识考古学最终是要验证历史的断裂、认识论的断裂，找出历史的非连续性。历史先验性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处于变化中，但在认识的特定阶段以及历史的特殊时刻它会成为具有某种固定形式的规律。笔者根据福柯本人的文本以及其他学者们的研究发现，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是使其运用知识考古学（后期转向系谱学）研究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基础。

首先，在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时，福柯“把具有内部可理解性的实践体系重新进行了组建”[[28]](#footnote-28)，而在其完成了组建后就能够建立某种话语和实践的内部合理性。根据福柯《知识考古学》所述，这种合理性应当是一种“实效性的形式”，它能够定义一个领域以及这个领域中形式的本质、主题的持续，它也就是历史先验的“角色”，它不仅仅在时间性上能够进行实践体系的组建，而且这种“实效性的形式”本身就是“一可转变组合”。

其次，在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话语运作的实践时，又发现了将“‘陈述’当作事物般建立的系统”，这一系统就是“档案”。根据福柯所述：“档案能够显示（这些事物）如何借着一套特殊的话语层次上的关系组合而出现，显示了为什么它们按照特别的规则性衍生，而不是像一些偶然形象在一种偶然的情形下被移植到一些静默的过程上”[[29]](#footnote-29)。此处，“特殊的话语层次上的关系组合”以及“特别的规则性”说明了在知识考古学背后的理论法则的存在，并且这种理论法则并非出于偶然，而应当也是以历史先验性为基础的法则。同时，这一理论法则的建立也应具有客观性和主体性交错的形式，它并非是通过连续的、必然的话语运作方式形成的。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理论法则应当是能够进行话语运作的实践的法则，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先验性。那么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所发展的权力-知识理论是否也具有这一特性呢？这就需要指出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的研究方法的转向问题了。

德赖弗斯和拉比诺在其所著的《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中引用了福柯1970年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就职演说《语言话语》，解释了福柯如何完成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向。他们指出，福柯在《语言话语》中提及了系谱学同考古学的关系问题，为了解释其自身理论的复杂性，他试图用系谱学补充考古学来维持考古学的成立，通过非理性实践提出了“陈述与话语的有效构成方式之间的互补性”[[30]](#footnote-30)。在这个时期福柯还是以知识考古学为主的，而在他理清考古学和系谱学之间的关系之后，他认为在考古学方面“推理构成的规则性被给予一种特许的独立”，这种“特许的独立”可能会破坏话语本身的先验性。而在系谱学方面，福柯揭示了没有任何东西构成现象的基础以及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因此任何事物都是无意义的并且缺乏严肃性。在这之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已经转向了系谱学，并认为系谱学优先于考古学，“系谱学家就是致力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知识以及肉体之间的诊断学家”，系谱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福柯后期的权力-知识理论体系。

这种对于系谱学的转向，以及将知识考古学用来补充系谱学的研究方法使得福柯可以走向对“权力更满意和自我意识的复杂分析的第一个主要步骤”。福柯对权力-知识理论十分重视，在发现了知识考古学的客观主张掩盖了主观动机之后，福柯认为系谱学应当成为他在研究权力、知识以及主体这三者的研究方法。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明确表示，系谱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主体也直接地包含在政治领域之中……权力关系直接地掌握着主体；这些权力关系给主体披上外衣……”[[31]](#footnote-31)。

因此，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转向背后的理论法则就是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而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法则对于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进行反驳，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一法则的作用以及运作方式进行探析。

## （二）权力-知识法则与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

如前文所述，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所依托的理论为权力-知识理论法则[[32]](#footnote-32)，并且福柯在后期主要的思想都是围绕如何根据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建立权力体系，进而能够使得理性的灵魂与历史得到和谐统一，而权力与知识也是福柯围绕主体问题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此厘清福柯微观权力学中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就是必要的了。那么权力-知识理论是如何支持福柯的思想体系，而不致使其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呢？并且它是如何能够与莫兰在文章中所论述的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相抗衡而不会倒向非理性主义的桎梏呢？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笔者认为首先应分别明确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以及“内部历史”概念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它们的合法性。而为了了解以上内容，就需要先行明确福柯思想体系中权力和知识分别具有哪些含义，同时明确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的内涵，进而探析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和“内部历史”概念的外延。

### 1.福柯思想体系中的权力

福柯之前的学者在理解权力的内涵时通常将其与暴力形式联系起来，如此权力就成为少数主体控制下的、大多数主体受其支配的可拥有的事物。就此特点而言，传统型权力的概念需要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使用，它通常象征着无知与暴力的强制性手段，权力与知识之间更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否定关系。因此，福柯试图寻找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重心在于“关系”而并非实在的权力手段，它不需要一个实在的权力主体或者权力中心而成为某种链状结构，同时这种权力关系是肯定性的而不再是之前的否定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新型的权力关系取消了传统权力观以少数人支配为核心的管理形式，变为多数的底层主体的权力，这样就使得权力与知识不再是外部的否定与矛盾而变为了互相渗透的共生关系。主体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降低了传统权力观下的抵制，尽管抵制依旧存在，但新型权力关系下的抵制成为了权力发展的动力。

在福柯的新型权力关系下，权力与知识得以良性共生，不再是先前的否定性冲突下的权力观，由此也使得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得以完善，那么知识在这一新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呢？

### 2.福柯思想体系中的知识

根据传统权力观解读知识的方式，知识应当是普遍客观的某种真理性存在，而由于这样的属性，知识在传统权力观当中是不能与权力同时出现的，因为如前文所述，传统权力观当中的权力代表了某种无知与愚昧。福柯所寻找的新型权力观体系中，知识不再以真理的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话语实践的产物。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以及系谱学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的改变，他将研究对象改为主体，并且将研究方向向着人文科学史改变。福柯在话语分析阶段的前期主要侧重于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前文所述在话语内部揭示话语的历史先验性。福柯在后期考察监狱以及精神病院时发现，以知识考古学为重心辅之以系谱学的方法会造成话语实践内部规则的混乱，因此，福柯认为不能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话语内部对知识作纯粹的考古学描述，而是应当转向系谱学，将话语和非话语领域结合起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探究了话语对象的架构问题，并以19世纪以来精神病理学的话语陈述为例，通过研究十九世纪初精神病院中排斥及监禁病人之新方式的建立提出一个疑问：“在这些话语对象并立或排列形成的一个散乱的精神病理学领域，我们可能发现一个推论性的系统，而此系统能适时地表现出大的鸿沟或知识的过剩吗？”[[33]](#footnote-33)由此展现出福柯认为由于话语内部历史先验性（知识性或者档案）的变化而导致思想领域的变化，转向系谱学能够使得权力-知识系统成为共生的理论法则，使得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成为肯定性的关系，权力不再是无知的，知识也不再是真理形式。

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中，德勒兹如下表述福柯思想体系中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权力已经给知识的维度画出一个不可缩减的第二维，尽管二者都构成了一些无法具体分割的混合体；但是知识是由形式构成的，是曲线图……他是从由知识创造的原始概念过渡到由权力创造的新概念。”[[34]](#footnote-34)权力为知识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性，而知识为权力提供了历史的时间性，在新型的权力关系中，空间性和时间性并非互不干涉的两种范畴，而是交错的、非连续的。

根据上面所阐述的福柯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中权力与知识的含义，可以认为福柯的新型权力观是对传统权力观在权力-知识关系上的巨大突破，这一突破打破了传统权力观权力与知识的紧张关系。同时，权力-知识理论的研究方法由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向也使得话语实践由内部转变为共生的内外关系。

### 3.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

在明确了福柯权力-知识理论中权力与知识的内涵后，进一步了解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以进行两者比较是十分必要的。莫兰认为胡塞尔所强调的历史性是在各种历史的更替和变换中，人类群体构建和生存的方式[[35]](#footnote-35)，他指出胡塞尔在1934年的题为《与历史性的科学和文化相关联的哲学的历史》文本中，以如下的方式来定义历史：“成为人类的科学，理解人类的意义，以及它周围的生活世界，它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不断发展的正在建立的文化的世界”[[36]](#footnote-36)而这样的定义方式与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的构想是很接近的。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称自己的研究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上是历史性的，跟随着某个主题的方向来揭露深层次的属于未知的历史。在这里，胡塞尔强调的是为了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历史主体的时间意识的‘交织性’而进行的历史解读，[[37]](#footnote-37)他真正感兴趣于“内部历史”，并且将其看作某种积极的科学。由于胡塞尔始终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在文化和传统中建立自身以及历史内部的“连通性”如何被建立，因此，他不会关注“真正的”、“外部的历史”，而是试图找寻历史内部显眼的必要性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使得历史的生活得以可能。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就是使得“从未被研究过的在所有结论之上的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结构对这一历史的生活来说是适当的。”[[38]](#footnote-38)

胡塞尔认为只有能够理解怎样将时间上的“现在”构成“现在”才能够真正理解历史，时间上的“现在”故意地暗示了“过去”，这其中蕴含着必要的结构法则。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是这样表述的：“只有必要的普遍的结构的‘揭露’……能够使得历史的调查成为可能，这个调查是真正理解的，有洞察力的，并且在普遍的意义上的科学。这是具体的，历史先验性。”[[39]](#footnote-39)

莫兰在这里将胡塞尔“内部历史”具体的历史先验性解释为人类存在的先验，是人类生活的特别方法，是存在的历史。的确有一个不变的、必要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必要的方式，它是从现在折返到过去以及从未来折返到现在。这个有着必要结构的法则可以揭示控制人类历史的进程，胡塞尔想要记述‘必要的’，‘先验’或者‘异常清晰的历史’，包括指出它隐藏的目标和‘动机’。对于胡塞尔来说，人类的历史性本身是受到绝对必然性和普遍真理控制的，这也就是胡塞尔所提出的‘历史的必然’或者‘必然的历史’以及一个普遍的‘历史的先验’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此外，胡塞尔在另一篇《<危机>补正》中写道：“当我们有系统地、有条理地承认历史的先验，它自身是否是历史的真实性？它是否会假定历史的先验？有关人类存在以及周遭世界的先验在经验、思想和行为上是正当的，但是先验概念有时是理想的和普遍的，先验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一方面，先验涉及到了人类自己作为课题的情形；另一方面，先验是在人类之中的一个结构，在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那里”[[40]](#footnote-40)。

胡塞尔对内部历史的解读是围绕着自己的历史哲学而展开的，他在试图寻找一种拥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特征的历史概念，他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历史性，而是关注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概念，也就是处于人类生活中的“内部历史”概念。因此，根据莫兰所述，在海德格尔之外，胡塞尔发展了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概念。

### 4.胡塞尔历史性概念与福柯权力-知识理论的比较

将胡塞尔和福柯的历史先验性进行比较有助于为下文回应莫兰的批评提供依据。由于胡塞尔和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在他们的学说中分别体现在“内部历史”概念和权力-知识关系中，因此这里重点对胡塞尔历史性概念与福柯权力-知识理论进行比较。

福柯所支持的微观权力学是不同于传统权力观的一种新型权力关系，首先，他认为传统权力观是用否定性的话语分析方法，并以此来描述对象和权力之间的一种纯粹否定性、矛盾的关系；在传统权力观下，权力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是人们用来管理以及统治大多数人的工具；传统权力观中的权力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发生变化，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阶层间都是统一的，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意志而转移。

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中，历史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福柯的新型权力观否定少数主体的支配地位，它并非以人类的存在当作历史的中介，历史朝向的目标并不是按照某种情感、本能或者特定的人类活动而规定的，不具有某种永恒的先验性规律。历史应当具有其偶然性,特殊时刻发生的事件或者产生的事物在相对的历史过程中具有固定的规律，但除此之外不具有连贯的历史性叙事。

笔者在这里并非将胡塞尔的权力观简单地等同于福柯所批评的传统权力观。莫兰在文章中指出，胡塞尔成熟的历史现象学追求的是描述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先验结构。就如同福柯一样，胡塞尔承认由于历史性在不同等级和层面上具有的多样性，可能导致历史性叙事不会凝聚成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叙事，但胡塞尔追问的是“这个历史的世界如何被构造的？”[[41]](#footnote-41)胡塞尔的答案是人类在结合为一个复数的群体意义上的活动共同凝聚成传统，并且人类用他们自己的特别的方式塑造了特殊的文化来发展和展现胡塞尔通常称之为的‘历史性’。对于胡塞尔来说这种塑造方式意味着人类团体建构以及生存的方式，通过时代的变更，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历史。胡塞尔声称有一种生命世界的先验结构为不同民族实际上具有的生命世界打下了基础，每一个历史性都是一个“形成的共同体”。另外，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性”或者发展它的历史的结构方式。历史性有不同的“层次”，虽然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暂时的阶段，相反，它们表明了不同层次的复杂的整体组织和社会的前景。胡塞尔在《<危机>补正》中曾写到：“历史性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总是已经发展着的，并且这种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属于人类存在的，它是一种整体的形成……它能够在有机体的共同体中被找到。”

对于胡塞尔来说，人类的存在，就像历史的暂时的中介，因为历史的，和其他人民参与，共同经历他们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朝向某个“目标”，它并非是不确定的——每个目标由我们明确地安排好并且毫无疑问的接受。胡塞尔写道：“人们的存在是一种目的论的存在并且是应该的存在且这种目的论在每个人和每个活动和自我的展现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他考虑到历史——尤其是哲学的历史——是受到合目的性或者被他称为“目的论”的东西所引导的，并且哲学的任务“是要理解目的论在哲学中的历史化”。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不同种类的作品中的目标是不够的，理解人类意向中介是如何完成这些目标的也同样重要。

每个公共的历史都有一个目的或者目标，“在历史中必然有‘意义’或者理性”。胡塞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目的是虚幻的还是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成就，处在历史中的一个或者其中的哪一个文明，胡塞尔自己清楚地相信：“第一个打破对人性必要性的是它的实体（entelechy）”。这种说法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只有欧洲在严格意义上有目的论，这个欧洲人的绝对理念是理论（theoria）。这种纯净理论的态度，影响了一个文化的特性以及自我封闭和接受无限的任务，它打开了一个无限任务的世界，又将人类联合在一起来追求理性的“自我责任”。从今以后人类的生活必须是一种绝对的自我批判以及永恒的。如果在其中加入福柯的观点，那么这个概念是内部结构驱动地一个特定的知识，是有意义的构成。

依据上述讨论，与胡塞尔对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概念的思考不同，福柯为了打破传统权力观对多数底层主体的支配行为，提出了新型的微观权力分析法，他并未将权力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是深入探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进而对权力、知识以及主体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此外，福柯并不认同胡塞尔历史性概念中关于人类主体地位的规定，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中人类并不是作为历史的主体或者中介，历史的真正主体应当是权力，虽然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体现出的历史先验性概念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结合的，但福柯对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关注焦点与胡塞尔是不同的。相比胡塞尔历史性概念以人类作为主体的思想，福柯权力-知识理论在历史先验性主体与客观性的结合上无疑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 （三）对莫兰的批评的回应

由于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完全可以与胡塞尔的“内部历史”概念进行比较而不致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因此，可以针对莫兰在文章中对福柯的批评进行回应。笔者认为莫兰既然是从胡塞尔历史性问题的基础和研究方法来论述胡塞尔历史先验条件，那么也可以从权力-知识理论的基础、研究方法这两个重要的方面进行回应。

### 1.权力-知识理论的基础——历史先验性

首先，莫兰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由于缺乏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会陷入非理性主义，但实际上，福柯对于理性和非理性有其特殊的规定。例如，在莫伟民的文章《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中，他指出福柯对于理性主义所持的是以下主张：“一是理性与非理性原本一体，区分开理性与非理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无可能……二是即使要谈论理性（也即非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理性也并非各种合理性形式的总和，因为理性有其在历史中的自动创造和展开，而且在知识类型、技术形式和辖治样式这三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多种合理性形式不仅没有崩溃和消失，而且正在大量产生和发生变革。”由于历史先验性是福柯在建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时最先考虑的基础性先验概念，所以还是先从这一基础入手来考量权力-知识理论的合理性。根据学者对福柯著作的分析可发现，在《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中，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不同的知识和权力相互结合、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权力为知识的向前发展提供动力基础，知识的产生也来源于权力赋予它的条件，权力与知识之间是一个四位一体[[42]](#footnote-42)的完整体系。因此，对于权力-知识理论法则的基础历史先验性来说，它背后蕴含的先验的历史性能够使得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的可控制范围内共生发展，这已经是福柯思想是理性主义的最好证明。

### 2.权力-知识理论的研究方法——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向

之所以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福柯认为，如果仅仅以考古学这样在话语实践内部用纯粹的考古分析方法来为话语实践进行话语分析，并且在话语内部进行对话语法则的规定，就会使得话语在未知的情况下得到规定，从而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发展。实际上，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的研究方法中是相结合而存在的，它们并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所以两种研究方法才可以使得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共生发展。

根据前文所述，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从其基础到其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进而到其自身对传统权力观的驳斥与发展，是具有理性基础的，不会如同莫兰所言使得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莫兰简单地用早期的思想去否定福柯整体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以及福柯的整体思想，然而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与其早期所主张的非理性化先验概念已然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莫兰在文章中对福柯的否定是不完全合理的，而是应当将福柯不同时期的观点分开来考量，承认权力-知识理论法则的合理性，并且以此来对传统权力观进行批判。

# 三、结语：历史先验性基础下的权力-知识法则

本文以莫兰对福柯和胡塞尔历史先验性条件的比较为出发点，从福柯系谱学的权力-知识关系入手，详细梳理和考察了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并回应了莫兰对福柯的批评。本文认为，莫兰对福柯的种种批评恰恰是由于其忽略了福柯在权力-知识理论时期以系谱学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先验性意义，因此，莫兰对福柯的批评是不全面的，并不适用于福柯思想的所有时期。

首先，在福柯历史先验性概念与莫兰所提出的胡塞尔先验概念的比较中，福柯早期的历史先验性接近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层面提出的一种先验性，此时还并未包含明确的历史先验性概念。在话语分析时期的《知识考古学》著作中，福柯就对形式的先验与历史的先验作了明确区分，并认为历史的先验不仅要考虑话语的意义问题，还应当考虑历史性的问题，如此就将历史性与先验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初期的历史先验性概念。之后的权力-知识理论时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研究方法的重心从考古学转向系谱学，使历史先验性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具体体现为权力-知识理论法则。通过探析权力-知识这一理论法则，笔者发现它对于福柯的主体性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权力-知识理论使得福柯思想中权力-知识-主体这三者联系在一起，并且使得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得以明确，深入刻画了历史先验性主体性和客观性的特征。由早期的思想到话语分析思想再到权力-知识理论，福柯的思想确实经历着变化，但权力-知识理论使得他关于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话语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不会陷入历史相对论和非理性主义。

若根据莫兰的文章所述，由于福柯的思想将知识看作非连续的，自发性的断裂，那么胡塞尔可能会认为福柯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实际上，由于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提供的是对现代权力体系的探究，因此它不会去询问“是谁”，而是去探究现代灵魂与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之间的关系。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使得人类及其生活世界形成一个规训的状态，并且能够在特定时间内保持这一规律，这就说明福柯并不会陷入历史相对论或者非理性主义，反而能够为主体寻找存在的体系；同时由于在权力-知识理论法则中包含了话语分析时期“历史认识论”问题中对认识论断裂的延续，因此在与“内部历史”概念的比较中，福柯的思想也能够成为更符合客观性的思想。

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则是延续其原始的先验概念，以人类及其生活世界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的内容是如何建立历史的意义和历史性的连通性，人类怎样使他们自身在文化和全面的传统中建立。胡塞尔认为这其中有必要的不变项的历史结构，但实际上认识论客观存在着断裂，这种必要性和普遍性只能是具有特殊性的。从这一点上看，福柯的理论实际上就说明了话语运作只在特殊的环节具有必要的不变环节。因此，福柯的权力-知识法则使得他不会陷入历史相对论的困境也不会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以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来回应莫兰的批评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并非是对胡塞尔先验概念的模糊表达，虽然福柯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存在着对历史先验性概念的不同表述，但福柯关于历史先验性概念的内涵在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愈发完善的。福柯后期关于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表述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概念，使得历史先验性成为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结合。因此，通过比较福柯历史先验性与胡塞尔的先验概念，可以证明福柯历史先验性的合理性。同样地，探析历史先验性基础下的权力-知识理论法则可以证明，福柯的研究方法由知识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后，其所建立的权力-知识理论对于胡塞尔内部历史概念的反驳具有有效性、合理性。

# 参考文献

1. 相关著作
2. Elder Vass: *The Causal Power of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10.
3. Michel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M·Sheridan Smith](https://book.douban.com/search/A%C2%B7M%C2%B7Sheridan%20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法]阿兰·布罗萨著：《福柯 危险的哲学家》，罗慧珍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法]德赖弗斯、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1992年2月版。

1.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
2.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
3.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法]福柯著：《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

[法]福柯著：《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法]吉尔·德勒兹著：《福柯 褶子》，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法]吉尔·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

1.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
2. 刘放桐、俞吾金主编：《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相关论文**

Amy Allen: Foucault and Enlightenment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onstellations, Vol. 10, No. 2, 2003.

Chloe Taylor: Foucault and Familial Power, Hypatia Publisher, Vol. 27, No. 1, 2012.

CR. Varela, The Romantic Realism of Michel Foucault The Scientific Tempt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 43, No. 1, 2013.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9, No. 1, 2016.

Dermot Moran, Edmund Husserl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Husserl Studies, Vol. 24, No.1, 2008.

Iuliana Corina Vaida: A New Kantian Solution to the Third Antinomy of Pure Reason and to the Free Will Problem,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47, No. 4, 2009.

Wolfgang Detel: Foucault on Power and the Wil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陈媛，解构中的建构：福柯思想解读的一种视角 [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12年。

莫伟民，《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闫堃，从知识权力解析福柯主体理论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山西大学，2013年。

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张梅、孔明安，《论“历史先天”——读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报（哲学研究及探索）》，2009年第4期。

张一兵，《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福柯<认识考古学>解读》，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张一兵，《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青年福柯的<词与物>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周慧，《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载《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1. 莫兰也在文章中涉及到有关福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反驳，并提出福柯拒绝任何‘现象学’接近给予了‘主体绝对的权力’，并提出了一个‘论述实践的方法’。 [↑](#footnote-ref-1)
2.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249页。 [↑](#footnote-ref-2)
3.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 [↑](#footnote-ref-3)
4. [法]吉尔·德勒兹著：《福柯 褶子》，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4、55页。 [↑](#footnote-ref-4)
5.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5)
6.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6)
7. Ibid. [↑](#footnote-ref-7)
8. 此处莫兰将这种“具体的历史先验性”称作是“a priori of history”，即先验的历史。 [↑](#footnote-ref-8)
9. 原文为：the historical a priori, the a priori of history, the ‘a priori of historicity’. [↑](#footnote-ref-9)
10.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10)
11. Ibid. [↑](#footnote-ref-11)
12.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12)
13. 张梅、孔明安，《论“历史先天”——读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报（哲学研究及探索）》，2009年第4期。 [↑](#footnote-ref-13)
14. 莫兰在《福柯与胡塞尔历史先验性的结构》这篇文章中转引了大量福柯和胡塞尔的原文，笔者在翻译莫兰的文章时也将这部分原文翻译出来。 [↑](#footnote-ref-14)
15. 莫伟民版中译本标明了此处的原文为“une nature”。 [↑](#footnote-ref-15)
16.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footnote-ref-16)
17. 同上。 [↑](#footnote-ref-17)
18. [法]福柯著：《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 [↑](#footnote-ref-18)
19. 同上。 [↑](#footnote-ref-19)
20. 此处即指知识史、思想史、意义史。 [↑](#footnote-ref-20)
21. [法]福柯著：《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 [↑](#footnote-ref-21)
22.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247页。 [↑](#footnote-ref-22)
23.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248页。 [↑](#footnote-ref-23)
24. See: Wolfgang Detel, Foucault on Power and the Wil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footnote-ref-24)
25. 此处以及前文引号内原文见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9页。 [↑](#footnote-ref-25)
26. 这些形式可以包括社会制度、组织结构以及“档案”等。 [↑](#footnote-ref-26)
27.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41页。 [↑](#footnote-ref-27)
28. [法]德赖弗斯、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330页。 [↑](#footnote-ref-28)
29.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249页。 [↑](#footnote-ref-29)
30. [法]德赖弗斯、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39页。 [↑](#footnote-ref-30)
31.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 [↑](#footnote-ref-31)
32. 这一点主要基于福柯的研究方法重心由考古学转为系谱学。 [↑](#footnote-ref-32)
33.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修订译本，王德威译，张国庆校，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9月第二版，第119、120页。 [↑](#footnote-ref-33)
34.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二版，第106页。 [↑](#footnote-ref-34)
35.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35)
36. Ibid. [↑](#footnote-ref-36)
37. Ibid. [↑](#footnote-ref-37)
38. Ibid. [↑](#footnote-ref-38)
39.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39)
40. Ibid. [↑](#footnote-ref-40)
41. See: Dermot Moran, Foucault and Husserl on the structural a priori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 [↑](#footnote-ref-41)
42. 四位一体：规范、循环、生产以及操作过程。 [↑](#footnote-ref-42)